学术专论

清初法国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尝试

——以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路易十四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吕 颖 侯 柯

[摘要] 17世纪下半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出于政治、宗教和科学等多重利益的考量，决定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洪若翰、白晋一行借助暹罗使团来访之机，经由海路启程；而阿夫里尔、巴纳贝等人则肩负起了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重任。为确保陆路畅行无阻，路易十四曾向沿途国家的君主写了五封信，恳请他们给予通行便利。尽管法国在十余年间进行了三次尝试，陆路开辟计划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失败与俄国政府的阻挠、不利事件的频发以及葡籍传教士的反对等因素都有着密切关联。

[关键词] 国王数学家 中法关系 赴华陆路通道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K249/K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2026）– 02 – 0093 – 009

谈及17世纪法国“国王数学家”，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称谓仅指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向康熙帝派遣的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使团。该传教团的五位成员承载着科学与宗教的双重使命，经海路抵达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17世纪下半叶，为绕过葡萄牙保教权的控制，路易十四还曾三次通过陆路向中国派遣“国王数学家”传教士。尽管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反映了中法早期交流的复杂历程。

目前，学界关于法国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研究相对有限。吴孟雪、吴莉苇对阿夫里尔（Philippe Avil）使团的初探进行了分析，但未涉及西里伯爵（le Comte de Syri）和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使团的后续尝试。① 勒博《东去的传教士剪影——伟大的行进者薄贤士（Antoine de Beanvollier）神父》虽穿插了开辟陆路通道的相关史实，但主要聚焦于薄贤士作

[**收稿日期**] 2025–05–30
[**作者简介**] 吕颖（1978— ），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天津300071，005037@nankai.edu.cn；侯柯（2003— ），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天津300071，houkenankai@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法国在华租界档案之整理与研究”（22VJXG015）阶段性成果。

① 吴孟雪：《明清欧人对来华通道的探寻》（一）（二）（三）（四）（五），《文史知识》1996年第2–6期。吴莉苇：《17世纪耶稣会士对通往中国之陆上通道的探索》，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4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54–175页。

为向导的第三次路线探索，对前两次尝试仅简略提及。[①] 普拉特纳《去往东方的耶稣会士》从罗马教廷视角讲述了三次路线开辟的艰辛，[②] 但完全忽视了法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利益导向及推动作用。鉴于此，本文将依托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的路易十四信件，以及阿夫里尔、维约特（Jacques Villotte）的回忆录等史料，复原法国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过程，并对其失败原因进行剖析。

一、派遣传教士赴华的背景

17 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入华的决定，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量：扩张法国的势力范围，开展科学勘测以及传播天主教。此举既体现了路易十四在巩固和增强国力方面的筹划，也反映了他在海外事务中谋求更大影响力的雄心。

首先，路易十四试图利用葡萄牙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矛盾，拓展法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1494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皇调停下签署《托德西拉斯条约》，从而确立了葡萄牙在东方的保教权。根据条约，葡萄牙需要承担招募、运送和资助传教士的义务；传教士东去也必须经过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并绕道里斯本取得护照。[③] 然而，到了 17 世纪，葡萄牙国力衰败，经济与航海优势受到法、英等国的冲击，难以有效维持对传教区的供养。为此，罗马教廷开始调整策略，1622 年成立传信部专门负责海外教务，1659 年推行宗座代牧制，由圣部主教直接管理传教区，以确保不同国家和修会的教士均受罗马的统一管辖。在这场博弈中，路易十四最初极力支持罗马教廷，他认为葡萄牙的保教权一旦被削弱，法国便可顺势介入东方事务，从而在政治上获得更大自主权。所以，当得知教皇拟派法籍宗座代牧赶赴远东时，路易十四便允诺为每人提供 1000 里弗尔的终身年金，且未来将增至 3000 里弗尔。[④] 事实上，路易十四的慷慨背后隐含着他希望这些法籍宗座代牧为母国效力的意图。然而，当获悉宗座代牧要求所有传教士向其宣誓绝对遵循教皇的诏谕时，路易十四意识到法国若想扩大在东方的势力，应当另辟途径。

其次，在财政大臣科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支持下创立的法国王家科学院需要派遣一批学者前往各地进行勘测、修正地图，为航海提供便利并完善天文学。当时，“大家对遴选将被派往印度和中国的人员感到最为棘手，因为这些地区在法国较少被人所知，且科学院的先生们还认为，在那里可能会有不受欢迎以及使执行计划的外国人感到不安的危险”。[⑤] 僵局之下，天文学家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提议从耶稣会士中选拔合适的人员，这不仅是因为耶稣会士在远东地区拥有传教团，更重要的是他们多为饱学多能之士，足以胜任科学考察的使命。科尔伯随即将这一方案呈报给路易十四，很快得到了国王的批准。

此外，天主教在华事业筚路蓝缕，迫切需要传教士的支援维系发展。1678 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致信欧洲，呼吁传教士来华，并强调精通天文学和数学的必要性。他写道：“我们神圣的天主教，如果披上天文学的外衣，往往更能赢得君王、地方长官等权贵的青睐，进而为教堂和教士提供庇护。”[⑥] 该信于 1681 年到达巴黎，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了广泛关注。自视为正教传播者的路易十四不会错过这个弘扬天主教的机会，一些传教士也跃跃欲试，积极

---

① Gabriel Lebon, “Silhouettes de missionnaires du Levant: Ⅰ, Un grand marcheur devant le Seigneur, le P. Antoine Beauvollier (1657–1708), ” *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Vol. 13, No. 2 (Juin 1936) , pp. 261–282.

② Felix Alfred Plattner, *Jesuits Go East*, Lord Sudley & Oscar Blobel, trans., The Newman Press, 1952, pp. 188–215.

③ 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43 页。

④ 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20 页。

⑤ 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郑德第、吕一民、沈坚译，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 251 页。

⑥ H. Josson, S. J. & L. Willaert, S. J. eds.,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23–1688),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 Palais des Académies, 1938, p. 237.

筹备赴华事项，但路线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若选择海路，葡萄牙的商船肯定会拒绝协助，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此前从未在东方海域行驶过。若选择陆路，如何确保沿途各国同意借道也是一个问题。

1684 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偕同沈福宗途经巴黎前往罗马。在凡尔赛宫觐见路易十四时，他重申了南怀仁的呼吁，力陈委派传教士赴华的重要性。恰巧此时，一支暹罗使团造访巴黎，转达了暹罗国王希望与法国结盟的意愿。鉴于暹罗和中国相距不远，路易十四决定派遣一批赴华传教士搭乘暹罗使团归航的船只前往东方。1685 年 3 月 3 日，“飞鸟号”战舰自布雷斯特港启程，除暹罗使节外，船上还载有六位赴华传教士：洪若翰、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和塔查尔（Guy Tachard）①。临行前，他们被路易十四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这一任命既是对他们科学能力的赏识，也是为了绕过东行传教士必须效忠葡萄牙的义务。

然而，此次海上之行仅是一个偶然契机。为确保传教士能够持续赴华，法国亟需一条稳定可靠的通道。海路并非良策，除葡萄牙保教权的限制外，航行还面临诸多危险。据柏应理估算，当时“自欧洲各地启程前往中国的六百名传教士中，最终仅有约百人成功抵达，其余皆因疾病或海难殒命途中”。② 因此，路易十四及大臣们始终在酝酿开辟一条赴华的陆路通道。此举不仅能够规避葡萄牙在东方的海上霸权与航行风险，还有助于和沿途各国建立直接联系。

二、阿夫里尔使团的初探

实际上，在洪若翰使团启程的同年，路易十四还派出了一支由两位传教士组成的赴华陆路探险队。其中，阿夫里尔曾在巴黎克莱蒙中学讲授哲学和数学，具备卓越的科学才能；巴纳贝（Louis Barnabé）自 1680 年起便在亚美尼亚传教，对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商路颇为熟悉。③1685 年 1 月 23 日，阿夫里尔从马赛港出发，途经阿勒颇等地，最终在迪亚巴克尔与巴纳贝会合。随后，由于亚美尼亚的传教职责所系，他们不得已暂时分开。④

1686 年初，两位神父于波斯的埃里温再度会面。二人结合从各方收集到的信息，制定了赴华路线：穿越波斯腹地直达里海西岸，继而北上至阿斯特拉罕，在当地加入一支前往布哈拉或撒马尔罕的商队，借道乌兹别克地区进入中国。⑤4 月 23 日，他们从埃里温出发，沿途对里海的规模与水文状况作了观察与记录。抵达阿斯特拉罕后，阿夫里尔根据布哈拉和北京之间约 40 度的经度差，估算出两地距离仅 613 古里，这一发现提振了他们的信心。随后，两人如愿加入商队，但同路的商人却因必经之路上爆发军事冲突的传言，宣布暂停行程。此时，来自俄国的消息带来了新转机：一支中国商队即将抵达莫斯科，并计划在冬季前返回。两人遂决意改道莫斯科，期望借机同行。⑥

然而，阿夫里尔和巴纳贝抵达莫斯科后，却遭到了俄国政府的重重阻挠。二人被移交司法部门，“如同嫌犯一般，接受了长达四小时的盘诘，问答密密麻麻写满了纸张”。⑦ 当他们寻得中

---

① 塔查尔抵达暹罗后，怀揣着让整个暹罗改宗的理想，脱离了赴华传教团。随后，他一生五次往返于欧亚大陆，推动两国外交，但以失败告终。

②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entrepris pour découvrir un nouveau chemin à la Chine*, Claude Barbin & Jean Boudot & George & Louis Josse, 1693, pp. 3–4.

③ Gabriel Lebon, “ Silhouettes de missionnaires du Levant, ” pp. 261–262.

④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p. 5–35.

⑤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 72.

⑥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p. 113–114.

⑦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 160.

国商队并准备启程时，俄国官员又以缺乏官方通行证明为由，禁止其穿越西伯利亚。数次交涉无果后，两人被迫折返欧洲。

3 月 12 日，两位传教士抵达华沙。巴纳贝随即返回法国，办理护照等官方文件；阿夫里尔则留守当地，关注莫斯科方面的动向。在此期间，阿夫里尔获悉了一则重要信息：波兰与俄国前一年缔结了《永久和平条约》，根据第 28 款的规定，凡持波兰国王护照者，皆可经由莫斯科前往中国。他立刻拜见了波兰国王索比斯基（Jan Sobieski），国王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但为他们颁发了护照，还表示将全力支持远行计划。①

巴纳贝的工作进展也极为顺利，路易十四不仅为他们签发了护照，更授予其“国王数学家”的称号。为避免行程再次受阻，他还致函俄国沙皇，信件内容如下：

> 崇高、卓越、万能而又宽宏的伊凡（Ivan V）和彼得大帝（Peter I）②……朕最为亲密的兄弟，最为完美的朋友：
>
> 朕尤喜扶持力所能及的虔敬事业。耶稣会士是良善忠诚的子民，他们将远赴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度传教，宣扬福音，广布真理，使该地民众皈依上帝。同时，他们也将进行必要的观测，以完善艺术与科学，此举关乎万国福祉。朕听闻，贵国通往中国之路便捷，遂恳请陛下赐予神父们许可及护照，使他们得以自由通行贵国领土海域，并能在境内获得保护与协助。朕承诺，若贵国有求于朕，朕亦将尽力相助，不分彼此。朕以敬仰之心，向崇高、卓越、万能而又宽宏的陛下们，朕最为亲密的兄弟，最为完美的朋友，虔诚祈求上帝，愿其赐福于你们，守护你们的安宁与荣耀。
>
> 1687 年 10 月 8 日，枫丹白露③

此外，路易十四又增派了薄贤士和尼瓦特（François Nivart）两位神父以支持这一计划。当法国耶稣会士赴华的消息传至波兰后，当地传教士踊跃请缨，最终波兰王国的雅波尔斯基（François Ignace Japolski）和立陶宛公国的特皮洛斯基（Conrad Terpilowski）成功入选。这四位耶稣会士学识渊博，各具所长。薄贤士在数学领域造诣深厚，并拥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尼瓦特则是一位思想坚定、勇气可嘉且耐心十足的青年神职人员；二人擅长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雅波尔斯基出身名门望族，曾掌管图尔内大学校务；特皮洛斯基则在维尔纳大学执教数学；两人的俄语均娴熟。④

双方任务完成后，阿夫里尔和巴纳贝商定于但泽会合，以便在冬季结束前抵达莫斯科。1687 年 11 月，巴纳贝和尼瓦特携带大批科学仪器在鲁昂登船，但不久后遭遇风浪罹难。薄贤士因错过登船时机得以幸免，随后经陆路赶赴波兰与阿夫里尔会合。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传教团的人数骤减，于是阿夫里尔决定在启程前扩充队伍。

三、西里伯爵使团的再探

为确保第二次远征能完成使命，阿夫里尔于 1688 年 2 月前往格罗德诺寻求援助。当时，波兰议会正在该地召开，众多王公贵族汇聚一堂，其中即将代表波兰国王经莫斯科前往伊斯法罕

①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p. 237–241.

② 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均为沙皇阿列克谢（Aleksey Mikhailovich Romanov）之子，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共治沙皇”。该信伊始，路易十四提及了他们众多的称呼与头衔，并详尽列举其头衔所涵盖的诸多领地与城邑，其中包括莫斯科、基辅、喀山、西伯利亚等。

③ 此封书信随巴纳贝神父在海难中遗失，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未留存副本。信件具体内容参见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p. 244–246.

④ H. Josson, S. J. & L. Willaert, S. J. eds.,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pp. 548–549.

的西里伯爵成为阿夫里尔理想的使团领袖。西里伯爵出身亚美尼亚，自幼长于葡萄牙宫廷，通晓多门东西方语言，早年便已皈依天主教。[①]

西里伯爵欣然应邀，并致函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la Chaise），陈述他对赴华路线的看法：

> 神父们所设想的穿越西伯利亚与鞑靼的路线固然最为便捷。但是我们有理由担心，沙皇对法国使团的不满情绪加剧，加之其正卷入对华战争，这或许会成为通行西伯利亚的阻碍。因此，我斗胆向阁下提议，经由乌兹别克地区和西藏的路线更为妥当，而且沿途也能使更多的民众皈依天主教。我认为巴纳贝神父（在世的话）也更倾向于这条路线，我也向阿夫里尔神父强调，这是最为稳妥的方案。本人在这些王国享有一定声望，曾在波斯宫廷与各地使节多有往来，他们回国后亦向其君主称颂我。我借由阁下，向路易十四陛下虔诚陈情，我愿亲自带领神父们赴华，并计划经由鞑靼和莫斯科返回。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开辟两条切实可行的路线，更有助于建立一条贸易与交流通道，方便天主教的传播。[②]

鉴于当时复杂的欧亚形势，西里伯爵凭借对中亚地区的熟悉，提出了第二条并行路线，即通过乌兹别克等地区前往中国，以应对西伯利亚通道可能受阻的情况。路易十四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撰写了三封信，托付西里伯爵分别呈递给沿途的波斯国王、乌兹别克大汗以及中国康熙皇帝。信中阐明了这些传教士身兼宗教布道与科学考察的使命，同时恳请各位君主为其提供通行和保护。具体内容如下：

> （致波斯国王的信）崇高、卓越、万能、宽容又不可战胜的国王，朕最为亲密的朋友：
>
> 愿上帝益增您的荣光，使您有幸福的归宿。朕的臣民，西里伯爵和传教士将远赴中国皇帝之处，在伟大帝国及其途中，进行天文和物理观测，此于地理及其他科学完善大有裨益，亦惠及万国。朕恳请陛下赐予他们在您领土内的通行自由，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和保护，使他们得以顺利完成使命。朕还希望，陛下能庇护身处贵国的其他耶稣会士，尤其是沙马基传教团。愿陛下亦同吾等之心，关爱他们；当他们求助时，满怀仁慈应之。因为神父们以全力扶助所需之人为己任，始终勉励臣民忠诚地顺从君主。在此，朕愿上帝增进陛下的荣光，赐您以圆满归宿。
>
> 1688 年 8 月 7 日，马尔利[③]
>
> （致乌兹别克地区大汗的信）崇高、伟大的大汗，朕最为亲密的朋友：
>
> 朕自西里伯爵处，听闻大汗金玉其质、超越群伦，获悉大汗崇尚美德、嘉许功绩，故朕特命即将远赴中国皇帝处的西里伯爵，代表朕向您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友谊。朕欲派遣一批博学多才的数学家，在中国及途中进行科学观测，以完善天文学和艺术，造福各国。朕恳请大汗赐予西里伯爵以及朕的数学家在贵国领土的自由通行权，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与保护，使他们能够完成使命。在此，朕向上帝祈祷，愿您，崇高伟大的大汗，朕亲爱的朋友，能够得其赐福。
>
> 1688 年 8 月 7 日，马尔利[④]
>
> （致中国康熙皇帝的信）杰出、卓越、万能而又崇高的陛下，朕最为亲密的朋友：
>
> 上帝垂鉴，愿增加您的荣光，赐您以福祉归宿。获悉陛下欲于左右及贵国广纳博通欧洲科

---

① Arthur Beylerian, “ Des lettres de Louis XIV au roi des Ouzbeks à propos de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 9, No.2 (Avril-Juin 1968), pp. 231–232.

②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p. 269–270.

③ Lettre de Louis XIV au Roi de Perse, 7 août 1688, Ministr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AE),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la Courneuve (CADC),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Vol. 2 (8MD2), pp.114–115.

④ Lettre de Louis XIV au Roi d’Ouzbek, 7 août 1688, MAE, CADC, 8MD2, p. 113.

学之贤士，数年前，朕曾谕旨派遣六位国王数学家为陛下带去巴黎城内著名的王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知识及最新的天文观测成果。然则，分隔两国的漫长海路，易遭不测，耗时费力。今朕拟再遣一批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随西里伯爵，取道更短、更安全的陆路以赴贵国。愿其等为朕与陛下相互尊重及友谊之见证，早日抵达陛下身边，以便西里伯爵归国后所著颂扬陛下之行为，使朕得以忠实见证一切非凡之事。在此，朕祈求上帝赐予您荣光日增，福祉满盈。

1688 年 8 月 7 日，马尔利[①]

为落实西里伯爵提出的路线，路易十四再次增派了包括维约特在内的两位传教士。按照计划，使团成员被分为两组：西里伯爵、阿夫里尔与薄贤士等人沿着既定路线直赴莫斯科；增援的两位神父从法国出发，前往沙马基的传教士居所。如果俄国批准通行，沙马基的两位神父将前往莫斯科与主力会合；若遭到拒绝，西里伯爵一行将改赴沙马基与后援队伍集结，随后经波斯北部和乌兹别克地区入华。[②]

1688 年 9 月，维约特等神父自马赛出发，西里伯爵一行也从华沙启程。行至立陶宛公国边境时，阿夫里尔因照料染疾的波兰神父暂时离队，西里伯爵等人先行抵达莫斯科。尽管持有官方证件，西里伯爵等人仍遭遇了俄国的种种诘难。俄方甚至有意将他和阿夫里尔分隔两地，不仅反复敦促他尽快离开莫斯科，还命令斯摩棱斯克的驻军阻止阿夫里尔前行。当阿夫里尔抵达莫斯科时，西里伯爵已前往伊斯法罕，仅剩薄贤士一人留守观察局势。阿夫里尔向总理大臣戈利岑（Vasily Gallitzin）呈递了路易十四致沙皇的信件，希望事件能有所转机。然而半个月后，沙皇却以无法保证传教士在西伯利亚的安全为由，拒绝了请求。[③]

1689 年春，阿夫里尔与薄贤士饱经波折后重返华沙，计划通过君士坦丁堡前往波斯，与西里伯爵共赴乌兹别克线路。然而抵达君士坦丁堡后，阿夫里尔因重病被迫返法休养，薄贤士只能独自滞留。数月之后，噩耗再次传来，西里伯爵在与维约特成功会合后，被随行侍从勒死。[④]西里伯爵的去世令整个使团失去了核心，原定通过乌兹别克地区进入中国的计划也彻底破灭。

四、闵明我使团的三探

1686 年，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前往欧洲述职，康熙帝命其返程时途经莫斯科，就中俄边界问题征询沙皇意见，南怀仁则希望闵明我借机获得陆路的通行许可。[⑤]闵明我抵达欧洲后，结识了德国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莱布尼茨与沙皇彼得一世交往密切，并有意在柏林和北京之间建立联系，于是写信请求彼得一世准许闵明我经西伯利亚返华，但遭到拒绝。[⑥]

俄国的态度并未阻止路易十四和罗马教廷的进一步尝试，他们决定借闵明我返华之机，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远征队伍，并制定了详细的规划。闵明我为总负责人，薄贤士担任向导，两人带领一批教士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设立前沿据点。随后，每年定期派遣一批新人，接替驻守在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和埃尔祖鲁姆等地的教士，使他们能够继续向东前往中国。[⑦]1691 年 8 月，路易十四再度致信乌兹别克大汗，恳请准许薄贤士等人通行。信件内容如下：

---

① Lettre de Louis XIV à l’Empereur Kangxi, 7 août 1688, MAE, CADC, 8MD2, pp. 111–112.

② Jacques Villotte, *Voyages d’un mission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Turquie, en Perse, en Armenie, en Arabie & en Barbarie*, Jacques Vincent, 1730, pp. 4–5.

③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p. 291–322.

④ Jacques Villotte, *Voyages d’un mission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 157.

⑤ Felix Alfred Plattner, *Jesuits Go East*, pp. 205–206.

⑥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 年，第 371 页。

⑦ Felix Alfred Plattner, *Jesuits Go East*, pp. 206–207.

崇高、强大的大汗，朕最为亲密的朋友：

朕听闻大汗德被八方，为众所仰，向善崇德，美行功业。是以，朕特命即将远赴中国皇帝处的薄贤士神父，代表朕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友谊。朕欲派遣一批备受尊崇的数学家，与薄贤士神父同往鞑靼、中国，并在途中进行科学观测，以精进天文艺术之学，为万国共谋福祉。若他们认为必要，且合于大汗之意，朕恳请您能赐予薄贤士神父以及朕的数学家在贵国领土的自由通行权，庇护他们在贵国设立居所，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与保护，使他们能够完成任务。为此，朕向上帝祈祷，希望您，至高无上的大汗，朕最为亲密的朋友，能够得其照拂。

1691 年 8 月 5 日，凡尔赛[①]

1691 年秋，闵明我一行抵达君士坦丁堡与薄贤士会合。团队中的肖梅尔（Chomel）和里卡尔（Ricard）留驻该地，其他八人于 12 月 8 日乘船前往埃尔祖鲁姆。1692 年 2 月，传教士们到达后，受到了维约特及另外两位耶稣会士的欢迎。新来的教士中除来自意大利的闵明我和德国的舒尔（Schuh）外，其余六人均为法国人。每位教士都身负特定使命，闵明我将与舒尔返回中国，拓展在华的传教事业。勃朗（Blanc）、马尔丹（Maldan）、苏瓦特（Souatre）负责埃尔祖鲁姆传教团的筹建工作。薄贤士作为路易十四的官方使节，将带领贝兹（Bèze）和阿尔尚博（Archambaud）继续东进，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设立传教点，并探索一条从撒马尔罕直达中国的陆路通道。[②]

然而，神父们的后续行程并不顺利。埃尔祖鲁姆的帕夏[③]因逃避波兰奴役支付了巨额费用，便将传教士们的到来视为弥补损失的一次机会。维约特认为赠送一些欧洲的珍稀宝物或许能够平息这场风波，而薄贤士却不屑于通过财物来打点关系。希望落空的帕夏愤怒不已，诬陷传教士们是间谍，还煽动亚美尼亚民众围困和攻击他们。[④] 薄贤士等人最终设法逃出，匆忙抵达埃里温。

这场意外使得沿线各传教点的工作几乎全面瘫痪：埃尔祖鲁姆的教堂无人问津，特拉布宗的驻地更是直面民众起义的威胁。所以，当传教士们到达伊斯法罕后，不得不调整原有计划。闵明我认为陆路入华希望渺茫，遂与舒尔、贝兹、阿尔尚博转赴印度果阿，再经海路前往中国。薄贤士带领包括马尔丹在内的两位教士向东挺进，继续寻求开辟陆路通道的可能。维约特则返回埃尔祖鲁姆，着手修复先前被摧毁的传教士居所。随后，舒尔在波斯病逝，贝兹和阿尔尚博在果阿被葡萄牙当局逮捕并长期折磨，最终殒命，闵明我只得独自返华。1693 年末，薄贤士再次计划经由鞑靼地区进入中国，但多次尝试均未如愿。1694 年 3 月初，因物资储备即将告罄，薄贤士及其同伴被迫中断行程，返回伊斯法罕。[⑤]

1695 年 9 月，罗马任命薄贤士为印度西北部苏拉特耶稣会驻地的负责人，他可通过印度前往中国，不必再探索陆路。[⑥] 在苏拉特，他再次见到了阿夫里尔。阿夫里尔病愈后继续致力于陆路开辟，但最终在前往孟加拉的途中因海难身亡。1699 年 11 月 21 日，薄贤士与数位滞留的法国传教士搭乘英国船只抵达广州。至此，法国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第三次尝试也黯然收场。

五、陆路通道失败的原因

法国开辟赴华陆路通道的计划最终未能成功，其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与俄国政府的阻挠、

---

① Lettre de Louis XIV au Roi d’Ouzbek, 5 août 1691, MAE, CADC, 8MD2, p. 156.

② Gabriel Lebon, “ Silhouettes de missionnaires du Levant, ” p. 267.

③ 帕夏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

④ Jacques Villotte, *Voyages d’un mission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p. 212–213.

⑤ Felix Alfred Plattner, *Jesuits Go East*, pp. 209–210.

⑥ Gabriel Lebon, “ Silhouettes de missionnaires du Levant, ” p. 278.

不利事件的频发以及葡萄牙传教士的反对都有关联。

首先，俄国方面拒绝借道是陆路开辟计划失败的首要原因。俄国冷漠态度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一方面，路易十四拒绝加入神圣同盟的举动，引起了俄国的强烈不满。当阿夫里尔首次抵达莫斯科时，沙皇正派大使前往法国，以劝说路易十四加入反奥斯曼帝国的神圣同盟，并希望耶稣会士利用天主教力量对其施压。[①] 然而，随着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不断壮大，法国地缘上处于三面受敌的困境，路易十四意图利用奥斯曼与哈布斯堡之间的矛盾牵制后者，因此拒绝加入联盟。[②] 当阿夫里尔等人再次到达莫斯科时，俄国大使访法期间遭遇的不快经历被一再提起，心有怨气的沙皇自然不肯准许法国使团通行。[③]

另一方面，俄国政府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心怀不悦，并将其迁怒于在谈判中为中国充当翻译的耶稣会士。俄方认为若无传教士协助，中国难以在谈判中取得胜利，于是夸大他们在谈判中的“破坏作用”。使团的官方日志甚至明确记载，耶稣会士偏袒中方，刻意阻挠俄方。俄罗斯人曾试图以蒙古语直接与中国人交流，但耶稣会士以“官方翻译”身份相拒，声称只有他们才具备充当中介的资格，并指责蒙古语翻译能力不足。[④] 因此，1689 年 10 月，俄国在使团还未从尼布楚返回之际，便下令关闭了耶稣会在莫斯科的驻地。而这次拒绝耶稣会士借道前往中国，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报复。

其次，不利事件的频发也是陆路开辟计划失败的一个关键缘由。赴华使团中的巴纳贝、尼瓦特、西里伯爵、阿夫里尔都在旅途中丧生，身在北京一直推动计划实施的南怀仁也于 1688 年去世。此外，沿途军事冲突和地方仇教情绪也是使团前进路上的巨大阻碍。卡尔梅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里海附近的敌对行动，迫使传教士们不得不重新规划路线；[⑤] 神圣同盟建立后，巴黎、莫斯科以及君士坦丁堡等地纷纷进入防御状态，传教士们的东进变得更加困难；[⑥] 亚美尼亚民众对周边耶稣会驻地的破坏活动也使他们举步维艰。

最后，葡籍传教士的反对也给陆路开辟计划造成了消极影响。开辟一条绕过里斯本前往中国的陆路通道，无疑触动了葡萄牙的核心利益。尼布楚谈判期间，南怀仁曾希望徐日昇（Thomas Pereira）借此契机推动西伯利亚路线的开通，但徐日昇却对这件事缄口不言。[⑦] 在第二次前往莫斯科途中，阿夫里尔曾致信在华耶稣会，告知队伍即将穿越西伯利亚抵达中国，期望得到北京同仁的协助。安多（Antoine Thomas）等人欲将此事呈报康熙帝以寻求支持，却遭到了众多葡籍传教士的强烈反对，而身为帝师的张诚也被禁止在康熙帝面前提及陆路通道的相关事宜。[⑧]

综上所述，17 世纪下半叶，法国出于政治、科学和宗教等方面的动机，通过海路和陆路的方式向中国派遣了多批“国王数学家”传教士。与洪若翰使团的声名远播不同，阿夫里尔、巴纳贝、薄贤士等人为开辟赴华陆路通道所做的努力却鲜为人知。十余年间，他们尝试过莫斯科、乌兹别克等多条路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一结果与俄国政府的阻挠、沿途变故的频发以及葡萄牙传教士的反对密切相关。这些未竟的探索揭示了中法早期交往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构成中法关系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

①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p. 219−220.

② Aurélien Denizeau & Ozan Örmeci eds., *Turkish-French Relations: History, Present and the Future*, Springer, 2022, pp. 13−14.

③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 312.

④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12, p. 47.

⑤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p. 113.

⑥ Felix Alfred Plattner, *Jesuits Go East*, p. 201.

⑦ 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王立人译，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137 页。

⑧ 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 129 页。

References

Avril, Philippe.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entrepris pour découvrir un nouveau chemin à la Chine.* Paris: Claude Barbin, Jean Boudot, George et Louis Josse, 1693.

Beylerian, Arthur. "Des lettres de Louis XIV au roi des Ouzbeks à propos de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9, 2 (1968).

Cahen, Gasto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12.

Denizeau, Aurélien and Örmeci, Ozan, eds. *Turkish-French Relations: History, Present and the Future.* Cham: Springer, 2022.

Gu Weimin. *"Yi tianzhu he liyi de mingyi": Zaoqi putaoya haiyang kuozhang de lishi* (In the name of God and Interest: a history of early Portuguese maritime expansio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3.

Josson, H. and Willaert, L. eds.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23–1688),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 Bruxelles: Palais des Académies, 1938.

Lebon, Gabriel. "Silhouettes de missionnaires du Levant: I, Un grand marcheur devant le Seigneur, le P. Antoine Beauvollier (1657–1708)." *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13, 2 (1936).

Pfister, Louis. *Zaihua yesuhuishi liezhuan ji shumu*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5.

Pinot, Virgile. *Zhongguo dui faguo zhexue sixiang xingcheng de yingxiang*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françai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13.

Plattner, Felix Alfred. *Jesuits Go East.* Westminster: The Newman Press, 1952.

Sebes, Joseph. *Yesuhuishi Xu Risheng guanyu zhong'e nibuchu tanpan de riji*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1973.

Villotte, Jacques. *Voyages d'un mission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Turquie, en Perse, en Armenie, en Arabie et en Barbarie.* Paris: Jacques Vincent, 1730.

Attempts by France to Establish an Overland Route to Chin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 Study Centered on Louis XIV's Letters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Ü Ying（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005037@nankai.edu.cn）

HOU Ke（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houkenankai@163.com）

Abstra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ench King Louis XIV, driven by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scientific interests, decided to dispatch Jesuit missionaries to China. A group led by Jean de Fontaney and Joachim Bouvet set sail,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visit paid by the Siamese mission. Meanwhile, Philippe Avril, Louis Barnabé, and others were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opening an overland route to China. To ensure unobstructed access through various territories, Louis XIV wrote five letters to the monarch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requesting their assistance in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 Nevertheless, despite France making three attempts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plan to open an overland route ended in failure. This failure was closely linked to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obstructions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frequent setbacks, and opposition from Portuguese missionaries.

Keywords: King's Mathematicians, China-France relation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 missionaries